

后“荷花淀”时期的孙犁



资料图：孙犁

□张玉瑶

今年7月11日，是孙犁先生逝世17周年的日子。

荷花淀、芦花荡、采蒲台的苇……谈起孙犁，我们眼前总能浮现起这一幅幅清新明丽的冀中画卷，和出没其中的英勇智慧的白洋淀人民。在充满血与火的抗战文艺中，孙犁以他抒情灵动的笔致，留下了诗情画意的余味，成为一个优美而独特的存在。

相比较起来，属于“当代文学”范畴中的孙犁，或许没有那么为人所熟知，但对于他的一生而言，无疑，前后两个孙犁结合起来，才能让我们更加完整而清晰地看到这位老作家的全貌，看到他比“优美”更为宏大的面向。

“老孙犁”与“新孙犁”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孙犁属于亲身参与过抗战及其文艺实践的一批知识分子。1949年，他随解放军进入天津，负责主编《天津日报》的文艺副刊。在这期间，他继续坚持文艺创作，陆续写出了《蒿儿梁》《吴召儿》《山地回忆》《风云初记》等作品，对抗战岁月中那些美而难忘的瞬间重新予以凝眸，尤其是那些活泼的女孩子形象，像清风般拂动读者心弦。

1956年的《铁木前传》是中国十七年文学小说的重要之作，孙犁将目光转向新中国成立后的新生活，在尝试探讨农村合作化的大时代框架下，依然流露着孙犁式的隽永诗意，衬着抹不去的生活气息与人情味，成为上世纪50年代文坛的重要收获。然而极为遗憾的是，《铁木前传》未竟篇时，孙犁不慎摔倒，又因长期劳累引发疾病，一病就是十年，这篇一度引发轰动、内涵丰富的小说也被搁置了，停留在第十九章上，余韵未尽，却没有“后传”。

接下来，又是十年“文革”，孙犁的创作被打断，仅零星写过几篇文章。按孙犁自己的说法，他是“十年荒于疾病，十年废于遭逢”。“文革”后期，孙犁长时间埋首于收藏整修古籍，并随手在包书的书衣上写下随想文字，后来结集为《书衣文录》出版。从这些短章中，颇可窥见一个不安年代中知识分子的复杂心境。

进入新时期，像许多“解冻”的老作家一样，孙犁也重新拿起笔来，焕发第二春，有“南巴(金)北孙(犁)”之说。但这一时期，除了一束《芸斋小说》外，他把更多精力放在了写作散文、杂文及从事文学评论上，从1979年到1995年，陆续出了《晚华集》《秀露集》《澹定集》《尺泽集》《远道集》《老荒集》《陋巷集》《无为集》《如云集》《曲终集》十部文集。然而，编定《曲终集》后，正如其书名，因疾病及其他种种原因，82岁的孙犁宣布封笔，也拒绝了采访、应酬和社会活动，仿佛悄悄从彼时正热闹的当代文坛“隐退”，在度过人生的最后几年后，于2002年溘然长逝。

以“文革”为界，文坛有“老孙犁”和“新孙犁”的说法，与那个清新诗意的“老孙犁”比起来，人们发现，新时期复出的“新孙犁”，笔调中换上了沧桑、反思与严峻的气质，文字更加遒劲有力，

是历经岁月磨砺与沉淀后的质地。

很多评论认为，孙犁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创作和当时的主流有一定距离，还有的评论直接将其定位为“革命文学中的‘多余人’”。但《孙犁全集》编者之一、《孙犁年谱》作者段华并不同意这一定位，他认为，孙犁实际上坚定信奉着政治决定文艺的观念，而他说的“离政治远一点”，不是说离开政治，而是说文艺作品不能图解政治，创作要遵循艺术规律。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现实主义还是浪漫主义都不能单一概括其风格。孙犁也说过，他最喜欢自己写的抗日小说，因为这些都是自己见到的东西，是对时代和故乡人民的赞歌；他也看到过不好的东西，但不愿意写，从来没有违背良心，制造过虚假的东西。的确，即便在人人自危的年代里，孙犁也没有贴出过一张检举的大字报，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良心的事。

“我的文学的路，是风雨、饥寒，泥泞、坎坷的路。是漫长的路，是曙光在前、希望的路。这是一部争战的，号召的书，呼唤的书。也是一部血泪的书，忧伤的书。争战中也含有血泪，呼唤中也含有忧伤。”这是孙犁对自己作品的评价，也是他人生历练的杂陈。这个从“荷花淀”中走出来的乡村青年、革命作家，晚年以冷峻清醒的笔锋，完成了对他一生的书写。

青年良师的精神能量

作为长期的副刊编辑与文坛前辈，孙犁不遗余力地扶持青年作家，上世纪80年代初还是新人的贾平凹、铁凝、莫言都曾为他所慧眼看重，两代作家之间凝聚了深厚的情感。在这些后辈作家的早期作品如《哦，香雪》里，也时时可见孙犁笔调的影子。

段华也是当年被孙犁先生所鼓励的年轻人之一，他曾在其《荷花的光影》一书中，娓娓述说了读孙犁40年、与孙犁交往十几年的所历所见，描画出一个

率真的晚年孙犁形象。

初遇孙犁时，段华还只是个16岁的中学生，因读了《白洋淀纪事》而慕名去天津拜访，自此与孙犁成了忘年交。他还记得第一次拜望时的场景，当时孙犁先生72岁，身体还好，耳聪目明，声音洪亮，说这是当八路军时(孙犁曾在晋察冀山地打过游击)练出来的。那一回，孙犁和这位小朋友谈了很多，还讨论了谶语的小说。后来，段华进入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学系读书，离孙犁家不远，更是常常拜访。

孙犁一生热爱和追随鲁迅，同鲁迅一样，也爱护青年人，愿意花费时间和精力去帮助他们，曾写过《小说与青年》等多篇文章，向青年传授艺术真谛。在给段华的信中，孙犁告诉他该如何读书、如何写作、如何处理工作中的难题。段华也曾数次领着20多岁的文学青年拜访孙犁。即便是中学生，他也认真对待回复。

“我刚和孙犁先生相识时，他一个人生活，正是晚年创作的高峰期。他很勤奋，连续创作的芸斋小说、小说杂谈、芸斋谈话等系列文章都在文坛风靡。在这期间我接触到他，和他谈天，亲耳聆听他的教诲，亲眼看到他的创作，感觉很幸运。”回忆起多年交往点滴，段华感慨道，从人生道路到人生观，从工作选择到阅读生活，孙犁先生都对他的影响太大了，“可以说，是我一生的学习榜样和精神支柱”。段华曾在新疆戍边六年，在反复阅读《孙犁全集》中，度过荒原上一个个孤寂的夜晚；而今到了知天命之年，依然会时不时拿出孙犁先生给他的信和题字来阅读，从中获取精神动力。

贾平凹曾评论说：“孙犁虽然未大红大紫过，作品却始终被人学习，且活到老，写到老，笔力未曾丝毫减弱，可见他创造的能量有多大。”诚如斯言，时隔多年，荷露清响里，我们依然能识别出那个熟悉的身影。

《从租界到风情区：一个中国近代殖民空间在历史现实中的转义》——文化遗产保护中的文化再生产

□夜凉

《从租界到风情区：一个中国近代殖民空间在历史现实中的转义》通过对不同时期居住在租界建筑中居民社会生活与历史记忆的追溯，说明文化意义的生成有其历史的客观性，同时也是通过人们在各种各样的历史空间场中的实践，不断地加以建构的。书中讨论了“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体现出的一种“文化再生产”原则。

作者李东晔主要以历史人类学与象征人类学的理论视角与方法分析了一个曾经写满帝国主义侵略符号的历史空间，在经历了100年的社会历史与文化变迁

后，如何可以被改写成为一种中外文化历史交流、增进相互了解、促进国际贸易以及发展城市旅游经济和时尚休闲消费的城市景观。全文共分七章，以对变迁和社会事件考察相结合的手法，从租界建筑历史、原租界区划空间中居民的社会生活史以及历史话语的变迁等三个不同的角度加以论述。

中国近代租界的设立、建造模式、建筑式样乃至使用无一不透露出那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中国社会内外各种势力及利益群体之间的多重权力斗争的一种结果。就天津租界空间及其建筑形成的历史特殊性而言，其间包含着多重且矛盾的文化象征意义，

这些意义往往同时存在，但却并非平行并列的关系。

由于租界建筑文化意义的复杂性，使得在对这类历史建筑进行保护和再利用过程中遇到比其他文化遗产保护更大的困难，价值评判的标准更加复杂，其原真性、历史性的基础在哪里？谁应当是作出评判的主体？这都应该是在一种“理解历史的精神”下来进行深思的问题。当下中国很多城市在对历史街区和建筑进行保护、整修和再利用的工作，正是一种文化再生产过程中的“创造”或“发明”。本书在学术上具有很强独创性，对城市文化遗产保护也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